

费耶阿本德的知识观演进

The Evolution of Feyerabend's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赵伟 / ZHAO Wei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江西南昌, 330077)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Jiangxi, 330077)

摘要: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 费耶阿本德发现, 科学知识总要基于一些默认的前提, 因而不存在中性的观察语言, 前后两个理论中的理论词项属于不同范畴。为解释两种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费耶阿本德研究古代自然观到现代自然观的转变过程, 进而发现除了言传的知识外, 还有意会知识。只有结合实践才能领悟意会知识, 进而解释科学词项的含义变化。不可通约性只对坚持词项有固定且清晰含义的哲学家存在。费耶阿本德的知识观演化, 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当代西方认识论从单薄走向厚重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 意会知识 不可通约性 实践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ttgenstein in his last years, Feyerabend found that as scientific knowledge always relies on some tacit presupposition, he held that there is no neutral observation language, and that the theoretical terms in the two theories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he investigated how the ancient concept of nature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modern one, and discovered that besides explicit knowledge, there is tacit knowledge, which may be grasped only by practice. Thus, Feyerabend interpreted the change of meaning of the scientific terms. Incommensurability is a problem only for philosophers who insist that a scientific term must have a fixed and explicit meaning. The evolution of Feyerabend's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can be seen, to a certain extent, as an epitome of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s transition from thinness to thickness.

Key Words: Feyerabend; Tacit knowledge; Incommensurability;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B502.41; N0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12.002

1977年, 已于两年出版《反对方法》的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在“学术休假申请书”中写道:“我的长期计划是建构一种知识论……它与通常的知识理论有两个区别:(1)它同时是一种科学理论和艺术(人文)理论, 不再将两者视为遵循不同标准的两个领域……(2)它将不包含任何抽象原则。”([1], p.346)费耶阿本德后来的作品中, 与这一目

标最接近的是1991年的《知识对话录》, 但该书没有采用学术文体, 观点也较为零散。可以说, 费耶阿本德并未完成他1977年制定的任务, 他的知识观演进也一直是一个鲜有人关注的话题。

2016年, 费耶阿本德的第四卷论文集出版, 其中包含几篇在费耶阿本德的知识观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早期文献, 这就使我们能勾勒费耶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维也纳学派的记录语句争论及其当代意义”(项目编号: 18ZX02)。

收稿日期: 2024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赵伟(1977-)男, 江苏扬州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
Email: wisdomexpert@126.com

阿本德的知识观的整体演化,本文便尝试依据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个概念在费耶阿本德思想中由隐到显的过程,指出费耶阿本德的知识观是随着他研究科学哲学的问题尤其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不断演化的。虽然费耶阿本德的研究焦点一直是科学哲学,但他的知识观演化,一定程度上却可以视为当代西方认识论从单薄(thin)走向厚重(thick)的一个缩影。

一、知识与语言的关系

自柏拉图以来,知识的定义就一直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哲学的语言转向后,最能代表这一定义的思想是早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给出的:“只说能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对不能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一旦说出的超过知道的范围,就会导致无意义的哲学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无非是说,能说的与不能说的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人的认识是一个家族相似的过程。这一观点最简单的表达,是英籍匈牙利裔物理化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说出来的”。([2], p.4)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知识是语言不能表达的,这样,知识就有言传的(explicit)与意会的之分:“通常所说的知识,如文字、地图或数学公式,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未表达出来的知识,比如我们关于行为的知识,则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把第一种知识称作言传的知识,就可以把第二种称作意会的知识。”([3], p.11)在科学哲学中,意会知识因库恩1969年为《科学革命的结构》写的“后记”而广为人知。

费耶阿本德1957年4月就与波兰尼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4], p.17)但他直到1987年的《告别理性》中才第一次提及意会知识:“在注意并解释现象的能力中,有大量……这种‘意会’的知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用语言表达。”([5], p.106)为完整而准确地描述费耶阿本德知识观的演变,我们这里把意会知识按强弱区分:弱意会知识是指虽然没有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但原则上

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强意会知识则是指原则上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而必须借助行为才能表达的知识。

在早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指引下,维也纳学派提出通过对科学的逻辑重建,清除形而上学。费耶阿本德早年在维也纳学派的克拉夫特(Victor Kraft)门下学习,“当时,我认为,只有科学知识,其余都是废话。后来我读到维特根斯坦。”([6], p.489)费耶阿本德读到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和《数学基础评论》的手稿,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送给他的。有一次,安斯康姆用一系列巧妙的问题让费耶阿本德看到,充分定义且看似自足的事实其实依赖并未显现的环境。所谓“并未显现的环境”,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语言游戏中做的事,总是基于一个意会的前提(tacit presupposition)”。([7], p.274)例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经典科学依赖的一个意会前提是,主体与客体、表征与实在的分离,但这个前提从未出现在经典科学的公式中,所以,单把明确表达出来的知识视为理解科学的充分条件,忽视隐藏在公式背后、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意会知识,显然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知识。由此,费耶阿本德开始质疑科学是否等同于科学理论与观察记录的言传特征(explicit feature)。([5], p.284)

既然主体与客体相关,就不存在超然的观察者(detached observer),即使日常语言也包含基本的语言规则,比如,我们常说太阳东升西落,但这句话其实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描述,“日常语言包含的……原理几乎不是明确表达的,而是暗含在主要的描述词项的用法中”,([8], p.85)日常语言包含一个非常发达有时甚至非常抽象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看出这一点,他差不多清楚地表达出来。只要我们观察并记录,就要使用传统的要素(‘生活形式’)”([9], p.37),观察语言中也包含很多意识形态的要素,“维特根斯坦与伽利略等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见解:我们借助我们拥有的理论,阐释观察陈述,而不是倒过来。”([10], p.247)

费耶阿本德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既然事实依赖于语言,用事实来验证或否证理论,就是一种循环:“不违背这些原理,就不可能说出或‘发现’一些东西;说出一些东西,做出发现,就会搁置这些原理。”([11], p.249)也就是说,从一个科学理论得到的观察,同属于这个理论的内部,不可能发现这个理论的缺陷。维特根斯坦道出这一缺陷的根源:“事物对我们最重要的那些方面,由于司空见惯,反而是隐藏的……人们根本不在意他们真正的研究基础。”([7], p.76)怎么才会让人们注意到这些意会知识呢?找一个与之对应的观点作对比。科学的要素“有的以简练的陈述形式给出,有的则是沉默的,只有通过新的反常观点的对比才能知道。”([11], p.124)实际上,费耶阿本德也指出,库恩的范式也应该照此理解:“范式包含易识别的特征以及未知的、但隐秘地指导研究的倾向和步骤,只有通过与其他传统的对比才能发现。”([12], p.66)正因为如此,费耶阿本德才提出理论的多元化,并指出好的经验论者不能只满足于批评明确表达出来的科学陈述,还要大胆提出相当一般的假定,这样才能发现旧理论隐藏的前提。

第二,“发明一个新理论,导致我们假定新要素的存在,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新要素与最初假定的要素就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13], p.14)因此,所有的事实和概念都要按新理论重新构造,新旧理论之间的演绎关系可能会中断,这其实就是著名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费耶阿本德1952年发现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用不可通约性这个词,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太明显”,([14], p.92)基础主义的还原论确实无法解释科学变化中的这一常见现象。不过,他仍由此得出三个重要启示:(1)尽管科学理论有初始假定,但仍涉及本体论;(2)哲学家不可能独立于科学家就完成本体论的构造;(3)意义的条件也随科学的进步而变化。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科学家在实际处理材料时不会与历史背景完全分开,必定有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他们看到的事实,即使没有理论,也包含一些已从视野中消失或从未显现

的意识形态成分、旧观点。所以,“观察陈述不仅负载理论,而且全是理论陈述”,([15], p.212)这句话中的“理论”既可以是新理论,也可以是旧理论。因此,当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矛盾时,也可以抛弃观察陈述,“即使一个直接的观察记录也不能免于批判和重述”,([8], p.198)这样,知识就不再有确定性——知识与确定性无关,柏拉图以来的与确定性相关的知识观显然存在本体论偏见(ontological prejudice),([13], p.9)这样,费耶阿本德就借助知识与语言的关系,从认识论回到本体论。

费耶阿本德在波普尔的研讨班上提出一个想法:“做出一项发现,常常不象发现美洲,而很象从梦中醒来,”([16], p.68)但没有引起包括安斯康姆、冯·赖特(Von Wright)等的维特根斯坦学者的共鸣,他们建议费耶阿本德研究具体的问题。因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知识这样的概念词也有家族相似性:“‘知道’一词的语法显然同‘能够’‘可能’这些词的语法密切相关。但是,也同‘理解’一词的语法密切相关。(‘掌握’一种技术)”([7], pp.88-89)维特根斯坦说的是知识的可传递性(transitivity)。比如,科学公式就是语言可传递的,属于言传的知识,但是,感觉性质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只能靠第一手的经验,对感觉性质的理解就是非传递的理解(intransitive understanding)。

不过,此时的费耶阿本德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并未到达安斯康姆等人的深度,他此时遇到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包括他对其他科学哲学观点的批判,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单凭言传的知识不可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标准,这其实是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观批判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观得出的结论。维特根斯坦自己必定考虑过不可通约性问题,他的著作中必定包含不可通约性的解决之道。费耶阿本德决定潜心研究维特根斯坦。

二、弱意会知识

费耶阿本德再读《哲学研究》时,该书已

经正式出版。为方便自己的理解,使《哲学研究》“看上去更像一篇进行连续论证的论文”,([16], p.126) 费耶阿本德就写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交给安斯康姆。安斯康姆将此文寄给赖尔,赖尔的评价是“一篇高效的缩写,而不是书评。”([14], p.93) 由于费耶阿本德拜读过赖尔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此书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写就的,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也明确提到赖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有相似之处,因此,赖尔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的评价颇有点“相互吹捧”的味道。不过,确实可以说,《心的概念》对费耶阿本德的知识观有深远的影响。

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提出,能力的知识(knowing how)与事实的知识(knowing that)既有某些类似,也有某些差异。理论家们关心的任务是,研究各种理论的本性、来源和凭证,但大多忽视一个问题:“如何完成任务。”([17], p.24) 一旦要完成任务,就必定涉及行动,实际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的主旨就是“口号只有关联到科学实践,才获得含义”。([9], p.129) 费耶阿本德这才觉得,“我们理解并促进科学时需要的那种知识,不是得自理论,而是得自参与。”([5], p.294) 费耶阿本德由此引入科学实践的参与者(participant)与旁观者(observer)的区分。虽然旁观者必须考虑参与者的问题,参与者也必须考虑旁观者的问题,但两者的意图不同:“旁观者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而参与者想知道怎么做”,([16], p.10) 对想要正确描述科学知识的人而言,“需要一种哲学,不只是从外部评论,而是参与科学过程本身。”([18], p.198) 从此,在费耶阿本德的思考中,实践的地位越来越高,因为个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会行动的规则。

学会规则的方法,当然是靠赖尔所谓的操练(drill),形成习惯(habit),比如靠死记硬背乘法口诀表。培养这种习惯的主要方法当然就是学会一种语言。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在考察部落社会的世界观之前,先熟悉该部落的语言和基本社会习惯。长期接触事物与情况的人会很快发展正确的语言手段,描述它

们的性质,人就变成“一台优秀的归纳机器”,([8], p.87) 这就把我们训练得跟应对日常情况差不多,“当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地说出简单语句时,就象一台说话的机器”。([12], p.120) 一旦掌握历史上提出的各个理论的语言,就会发现,它们的共同因素“并不是这些理论依赖的某个事实,而是提出这些理论的行为本身”,([18], p.49) 在这些理论中寻找共同的要素必定是缘木求鱼。

以上差不多是费耶阿本德的弱意会知识,他借用赖尔提出的“经过长期操练形成的习惯”,参与科学家的语言游戏,驳斥言传的知识观按标准化流程统一理解所有科学知识的做法。关于弱意会知识的讨论,费耶阿本德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应该把科学视为一个复杂且高度异质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未来意识形态的模糊且毫无关联的预期与高度复杂的理论系统和多种固化的思维形式一并发展。这个过程的某些要素有简要而明确的记载,而另一些则隐蔽地存在,只能通过对比才能发现,即通过大胆的新思想。”([18], p.171) 科学理论的异质性来自于物质世界的异质性,因此,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不可通约性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解决。费耶阿本德甚至觉得,实践和理性只不过是实践的不同形式,非理性的东西是理性的东西形成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异属于实践的结构差异,而不是实践的类型差异。

这段时期的费耶阿本德“把人类的实践变成概念考察的向导和概念重组的提示物”,([8], p.98) 只是为了掌握这个实践的规则,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按路标的指示走路,没有理由”。费耶阿本德虽然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科学实践,但这只是从新理论回溯至旧理论的前提,他使用较多的词项是“习惯”“习俗”(custom)和“自动地”(automatically),“传统和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不仅通过能明确表达的规则 and 标准。当记录一个观察,面对一个微笑,检验一个复杂的计算结果时,我们可以‘自动’应对,不需要咨询明确的规则,不需要说涉及哪些规则。也不可能避免这类行为。”

([18], p.208) 这样的哲学家尚处在通过努力学习语言, 遵守规则的阶段。但是, “说一种语言意味着既遵守规则又改变规则”, ([5], p.267) 既然知觉受理论信念的影响, 要解释科学的变化尤其理论的不可通约性问题, 就不可能不引入主观的考虑, 因而对科学的变化就不可能给出形式的和客观的理论说明, ([8], pp.91-94) 这就自然走向相对主义。正是在为相对主义辩护的过程中, 费耶阿本德发现, 科学创新的过程中还包含强意会知识。

三、强意会知识

费耶阿本德最初只能发现弱意会知识, 是因为他忽视赖尔区分的两种素质: 一种是靠操练形成的习惯, 另一种则是靠培训形成的智力 (intelligent capacities)。([17], pp.44-47) 靠操练形成的习惯, 只能理解弱意会知识, “知道怎样做” 虽然是以参与者的视角进入科学, 但只是经过反复玩一种游戏后产生的下意识行为, 并未涉及从一种游戏到另一种游戏的转换。费耶阿本德想找到这些转换发生的条件, 这样就可以找到客观主义知识论的病根。“为什么知识应该在学术文体和推理的外衣下予以说明? ……难道没有不同形式的知识吗? 有些知识不是比公元前七世纪和六世纪的希腊形成的‘理性主义’要详细得多、实际得多吗?” ([16], p.131) 这其实是理性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这是《反对方法》的“一切论证的基础”, ([16], p.6) 正是在应对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费耶阿本德发现强意会知识, 即原则上不能用语言完全表达而只能见诸行动的知识。

众所周知,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三种类型——科学 (episteme)、技能 (techne) 和智慧 (phronesis), ([19], pp.169-174) “科学” 相当于理论知识, 而技能则是指各行各业的专门技能 (expertise), 是具体的知识, 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专业人士对环境随机应变的能力; 它使用工匠、航海家和艺术家的慧眼和巧手, 并随着他的手艺而发展”。([9], p.17) 这些知识不是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而是体现在各

行各业的作品中, “石匠、铁匠、画家、建筑师和工程师显然保持缄默, 但他们留下各种建筑、隧道、和艺术作品, 表明他们关于空间、时间和材料的知识, 比哲学家的思辨产生的任何东西都更进步、更有成果、更详细。” ([5], p.118) 这种知识观其实早已有之, 费耶阿本德不过是给出新的佐证。

费耶阿本德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他把神话、政治思想、宗教体系都当作理论, ([8], p.105) 进而发现知识的多样性。例如, 他研究神话时, 不是把神话当作一种保持社会与宇宙和谐的粘合剂, 而是认为神话是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撑的思想系统, “原始人的神话至少部分再现他们的专业知识, 表达一种处于初级阶段的自然观。这一初级阶段包含的某些要素比今天的科学假设和科学方法更加符合自然”, ([1], p.67) 神话的创造者拥有复杂的事实知识, “原始神话的目的与科学理论完全一致: 理解那些引人注目的自然现象, 并解释其原因。连方法都是一样: 从手头的观察材料归纳出结论。” ([1], p.7) 因此, 古代没有统一的知识概念, 表达我们知识或知识获得方式的词有很多个。但是, “这些发现者、发明家、思想家的标准、程序和思想, 部分是直观的——没有明确的描述, 只能从他们的行为中读取——部分由他们的行业决定”, ([9], p.16) 它们表达在行动中, 但对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反对方法》中, 费耶阿本德用大量篇幅论述伽利略是借助望远镜才“发现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成分的经验”, 但是, 望远镜这一对现代科学的诞生极其重要的工具却是在校园之外产生的, 几乎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任何帮助, 而且领先于伽利略提出的科学知识, 这就表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另外, 航海家纠正地图, 驳斥古代的地理概念, 艺术家确立几何与人的视角的关系, 工匠增加金属矿产知识, 草药医生丰富药学, 等等, 他们取得的成功让人们相信, 不需要关注学术标准, 也能获得知识。“这种知识的发展和改进, 有很大的定力 (staying power)”, ([5], p.119) 因为它们具体的知识, 而不是借助概念得到的知

识,因而不存在演化的问题。这种知识在现代科学的实验中同样不可或缺,“人与实验装置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仍叫‘知识’,因为它保持人与装置的接触,而不是破坏这些接触。”([5], p.28)科学家不理解设备,相当于历史学家不了解历史人物。但是,实验步骤往往无法明确交流,只能在具体实践中学会,语言至多只能起指导作用,掌握这些技能仍依赖实际的练习,而不是书面的文字指导。

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是实在的塑造者,不过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塑造者,因为他们不仅对世界采取因果行为,而且创造语义条件,努力从已知效果大胆推断新颖的预测,也反过来,从预测推断可检验的效果”。([20], p.188)科学家产生新知识的能力不依赖于一组固定的规则和步骤,而依赖于他们选择不同方法的能力,“我们寻找的规则几乎很少明确表达出来……而是通过熟能生巧这样无法精确评价的东西,间接支配实践。”([18], p.159)这种熟能生巧的东西,就是能力的知识。但这种能力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至多只能列出一些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即通常所谓的“经验之谈”。

四、强意会知识之后的不可通约性

费耶阿本德考察各种各样的知识,旨在象维特根斯坦考察自然语言那样,考察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理论的演化,找到不同知识的地位变化:有的弱意会知识变得明显,而有的言传知识退化为背景。发现强意会知识之后,费耶阿本德重述他以往的看法,首先是对观察和实验的描述有变化:“可观察事件的每一个描述,都有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一面。客观的一面是确认它适合一种特定的情况,主观的一面是,让这种描述适应情况的过程,也改变情况本身。描述中丢弃的特征逐渐沦为背景,描述强调的纲要变得更加显眼。只有在最初引入描述时才会注意这些变化;当描述变成惯例时,这些变化就消失了。‘常见’事实的这种表面的客观性是培养与遗忘共同造成的,并得到遗传

倾向的支持;它不是深刻洞察力的结果。”([5], pp.106-107)费耶阿本德特别强调仪器和实验在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所有成分都能清楚地用陈述写下来,这不是唯一的知识,甚至不是科学中的唯一知识。实验者务必要熟悉仪器。”([6], p.498)从实验的角度,更容易理解传统的知识观忽视强意会知识的原因:“实验干预的方式很特别,消除干扰,创造强烈的效果,在没有歪曲和放大的条件下观察自然运行的机制。当我们得出研究结论时,就忘记实验,谈论自然,仿佛不受任何干扰。”([20], p.236)由此可见,当人们形成公式化的科学知识时,就忘记实验和仪器,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自然的丰富性被征服,意会知识被遗忘。

发现强意会知识之后,费耶阿本德甚至指责维特根斯坦只提遵守规则,并没有提到发明规则。实际上,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发明就是遵循灵感:“遵循灵感与按规则行动,区别是什么?在灵感的情况下,我等待引导。我不可能将我追随这条线的‘技能’教给其他任何人。”([7], p.130)灵感就属于强意会知识,类似于科学哲学通常避而不谈的“发现的逻辑”,因为众所周知,从经验到原理,根本没有逻辑的道路,也就是说,无规则可言。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实践”,并不包含发现的过程。不过,大科学家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经验之谈”,所以,费耶阿本德提出:“要理解科学,就理解大科学家的成就。科学研究是一种艺术,它的明确特征只揭示其可能性的很少一部分,它的规则往往悬而不决,并随着偶然和人的创造性而改变。”([5], p.189)他这方面的很多观点直接来自马赫(Ernst Mach)。可以说,是马赫为费耶阿本德的强意会知识补上最后一块拼图。

费耶阿本德最初发现不可通约性问题时,一直站在哲学家的立场,始终不知道科学家做出科学发现时的强意会知识,由于强意会知识不仅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而且是科学家自身最重要的天才因素,因而费耶阿本德即使以参与者的视角看待不可通约性,也仍然游离在真正的发现过程之外。当他意识到有强意会知识存

在后,就提出对待不可通约性要有正确的态度:“当科学革命发生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它能变成合理的,以及人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违反理性(‘理性’一直指参与者可企及的理性形式)。显然,对每一位研究者来说,这种检验是最为重要的”,([12], p.171)这显然是从身处科学发现过程的科学家角度做出的判断,因为科学家知道说一种语言意味着既遵守规则又改变规则,“不可通约性对哲学家是一个难题,对科学家不是”,([5], p.171)而哲学家在论证时始终看不到其中蕴含的强意会知识,因而一直坚持知识增长的合理性。

结 语

费耶阿本德从最初信奉“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14], p.75)到最终承认:“我们声称拥有的知识是一个由理论原理和实践能力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不能通过专门只看理论来理解它。因此,绝大部分流行的关于科学的阐释和许多哲学分析纯粹是幻想。”([21], p.101)费耶阿本德的知识观的演变过程,是意会知识由弱至强、由隐到显的过程,他最终也用意会知识重述他自己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的思考。([22], p.269)费耶阿本德从语言哲学返回认识论再回到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西方认识论在哲学的语言转向后从单薄走向厚重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Feyerabend, P. *Philosophy of Nature*[M]. Trans by Dorothea Lotter, Malden: Polity Press, 2016.
- [2]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 [3] Polanyi, M. *The Study of Ma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 [4] Oberheim, E. *Feyerabend's Philosophy*[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6.
- [5] Feyerabend, P. *Farewell to Reason*[M]. London: Verso, 1987.
- [6] Feyerabend, P. 'Concluding Unphilosophical Conversation'[A], Munévar, G. (Ed.) *Beyond Reaso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Feyerabend*[C], Dordrecht: Kluwer, 1991.
- [7]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 译、陈维杭 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8] Feyerabend, P. *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9] Feyerabend, P. *Problem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0] Feyerabend, P. 'Patterns of Discovery'[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0, 69(2): 247-252.
- [11] 法伊尔阿本德. 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 周昌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 [12] Feyerabend, P.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 [13] Feyerabend, P.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4*[M]. Stefano, G., Jeseph, A.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4] Feyerabend, P. *Killing Tim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5] Feyerabend, P.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M]. 3r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3.
- [16] 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7] 赖尔. 心的概念[M]. 徐大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8] Feyerabend, P. *Knowledge, Science and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M]. Preston, J.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0] Feyerabend, P. *Conquest of Abundance: A Tale of Abstraction Versus The Richness of Being*[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1] 费耶阿本德. 科学的专横[M]. 郭元林 译、韩永进 校,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22] 赵伟. 被忽视的意会知识——评费耶阿本德《科学的专横》[J]. 哲学评论, 2019, 24: 268-281.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